

聆听智慧

——在文学馆听讲座

平和与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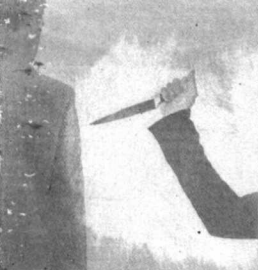
周思源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
余秋雨 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
周汝昌 《红楼梦》艺术的个性
蔡义江 《红楼梦》一书是怎样写成的
黄永玉 大画 / 话《水浒》人物

余光中 创作与翻译
钱绍武 艺术漫谈
叶嘉莹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
李 辉 平和或者不安分
——我看沈从文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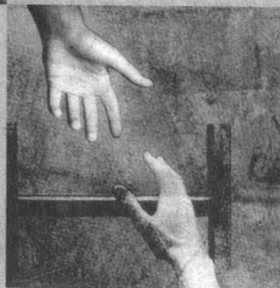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平和与不安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和与不安/傅光明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1

(在文学馆听讲座丛书)

ISBN 7-80187-485-4

I. 平... II. 傅... III. 文学——文集 IV. 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322 号

平和与不安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责任编辑:李 林 刘春梅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50 千 印张: 16.75

印数: 1—8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485-4/G.178

定价: 25.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守望(代序)

说书之前,我得先说说文学馆演讲的由来。2000年5月2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开馆。7月30日文学馆前任馆长舒乙先生主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重新揭开已在旧馆址坚持了十余年的星期义务演讲的序幕。到目前为止,新馆举办的“在文学馆听讲座”超过百场。除个别场次,几乎场场爆满,以保守的每场400人计算,现场听众也已超过了40000人次。

2002年7月,“在文学馆听讲座”于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每周三中午十二点半定期播出以来,电视观众辐射全国,即便以低收视率来统计,累计观众人数也近亿次,而观众尤以文化人居多。一些录制现场演讲编辑而成的电视节目,均有不错的收视率,特别是其中的几个系列:《新解〈红楼梦〉》、《品读〈水浒传〉》、“三八”特别节目《女人说话》和《走进老舍的文学地图》。可以说,在全国的演讲活动中,“百家讲坛·在文学馆听讲座”独具品牌。这也是文学馆与央视强强联手的一个显著成果。

由我这个演讲主持人来说文学馆的讲座,或有老王卖瓜之嫌。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得从心底往外由衷地说一句:“在文学馆听讲座”真是好!

先说主讲人,无论作家、学者,几乎都是一流,大多既有满腹学问,又有很好的演讲技巧。随口就可说出一串来文学馆演讲的响当当的名字:周汝昌、冯其庸、黄永玉、王蒙、从维熙、余光中、叶嘉莹、龙应台、陈建功、刘震云、格非、严家炎、孙玉石、柳鸣九、杨武能、刘世德、杨天石……说真的,两个小时的演讲时间,对一个演讲者来说,显得过长,内容与节奏并不是十分好把握。文学馆对所有的演讲者都充满了感激和谢忱,是他们和广大的听众及现在的电视观众朋友一起托起了“在文学馆听讲座”。另外,中国网通北京市通信公司一直坚持独家无偿赞助,也堪称义举。

“在文学馆听讲座”仅就书而言,力求保持口语化的通畅与学术思想水准。读时有聆听讲座的现场感,读后也会掩卷而思,获得启迪,像周汝昌的四次《红楼梦》演讲,叶嘉

莹的《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余秋雨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王蒙的《挑战与和解》，蓝英年的《被现实撞碎了的命之舟》，周思源的《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杨天石的《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龙应台的《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郭小聪的《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带给听众和读者的无不是智慧的闪光、情感的浸润与审美的愉悦。

听众有一个共同的感慨，他们觉得文学馆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坚持义务的纯文学演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希望不间断地办下去。有听众把听我们的演讲当成一种高尚的休闲和完美的精神享受；有位听众形容自己仿佛一条疲倦的人生小舟找到了一个加油、打气、停息、保养的港湾；有的听众希望演讲更成体系一些；有学生听众则提出来对已经改编成电视剧的影响很大的文学作品开设专题讲座，多一些大中学生熟悉的文学作品的讲座；有的希望适当的时候，召开作家、评论家与听众的座谈会；适当增加青少年作品的讲解；有的听众听得不过瘾，还嫌我们的演讲时间短，建议延长时间，中间休息一次；也有的希望把演讲增加到每周一次；有的建议我们搞会员方式；有的希望我们从更多渠道发布演讲预告，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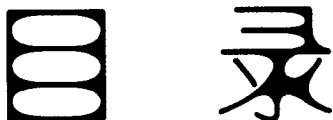
很多建议都很让我们感动，有位学法律的大专学生，希望文学馆能为中国的文学界营造一个进步的、自由的、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能在中国文学消沉迷惘或起肥皂泡的时候，及时纠正其发展方向，使文学创作真正反映中华文化的精髓；愿文学馆成为文学爱好者开拓视野的重要场所，愿文学馆为中国孕育杰出的文学家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的说来，演讲过程中的整体气氛和效果非常好，最后的听众自由提问时间，气氛更是显得活跃、热烈。这在书里同样完整地保留。

我从2001年2月18日接手主持演讲，至今已快干满了一届总统任期——四年。在我心里，我已经把它看成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学术争鸣的讲坛，一座承载文化的殿堂，一角文学精神的家园，一方传播知识的净土。

傅光明

2004年10月2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守望 (代序) 1

周思源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 1

所谓康雍乾之世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统治的基础上的,是以萎缩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牺牲国家发展前途为代价的,这个代价大得可怕。

余秋雨 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 37

在这个作品里面永远有一种两难的选择,选择完以后还是两难。它开辟了一个宏大结构……用他的写作技巧开辟了一种巨大的阅读经验。

周汝昌 《红楼梦》艺术的个性 69

中华文化传统看文学艺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作品看成一个活物,它如同人一个样子……它有生命,在人家的眼里一看,有骨有肉有血有脉,这生命生理上所具备的一切它都具备了,而且它有性情。

蔡义江 《红楼梦》一书是怎样写成的 85

五次修改,第一稿有人提出他那时不叫《红楼梦》,也不叫《石头记》,叫《风月宝鉴》,在《红楼梦》故事里面讲到风月宝鉴,而且在书开头也提过“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

黄永玉 大画/话《水浒》人物 119

老了以后还是想画《水浒传》,于是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画了出来。一边画一边跟画里的人物开玩笑。比如说不太引人注意的轰天雷凌振……他是个管放炮的,所以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目 录

余光中 创作与翻译 145

其实中华的文化呢,小圈子里面有更大的圈子,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么,中国人无论到世界各地去,只要不忘记自己的文化,掌握住自己的中文,那你就是同心圆的其中的一个圆。

钱绍武 艺术漫谈 171

静观默察盯着看、默默地观察烂熟于心。在心里烂熟了都是痛苦,今天痛苦、明天痛苦、闭眼就痛苦,反复体会的痛苦,把痛苦集中起来凝神而想,一挥而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创作方法。

叶嘉莹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 201

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时代,我们学习这古老的古典诗歌,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它最大的用处,不但使你有一颗不死的心灵,而且使得你的心灵在跟随古人提升学问、品行、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 辉 平和或者不安分——我看沈从文 223

因为沈从文,从来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他是永远在议论政治,永远在关注政治,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他是一个职业的作家和教授,这是一点,他自己讲:“我是一个乡下人。”

如何正确看待康雍乾盛世

周思源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王朝》，使大家提升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给百名省部级干部讲座的时候，题目就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在充分肯定康雍乾盛世时也指出了它“沉沦”的原因。不久，周先生就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与戴逸先生提出商榷。周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觉得称康雍乾“之世”好像更正确。在之后又不久，有一位姚小平先生再次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与周先生再商榷。我想文学馆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学术论争的讲坛，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中华读书报 2002 年 3 月 21 日一期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以下简称《沉沦》）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6 月 19 日该报发表了 my 的《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7 月 17 日该报刊登了戴逸先生《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一文（以下简称《怎样》），后来又有别的学者参加争论。由于报纸上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今天我稍微多说几句。

“康乾盛世”的提法由来已久，有时也叫“康雍乾盛世”，不过用得较少。一是“康乾盛世”是两个双音节构成一个四字结构，比较顺口；更主要的是，由于雍正皇帝一直背着窃诏篡位、弑父屠弟的恶名，所以尽管雍正夹在康熙、乾隆之间，“盛世”却很少有他的份。虽然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和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等早已开始对

此质疑，但直到 20 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旅日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多次赴台湾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二万多件康熙朝尤其是雍正朝的密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初出了一本《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①，才算把雍正的案彻底翻了过来。从此“康乾盛世”就称作“康雍乾盛世”了，不过人们习惯上有时仍然叫它“康乾盛世”。

清朝（1644—1911）三百六十八年总共十个皇帝，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雍乾三帝就占了整整一半一百三十四年。其中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一年（1662—1723），雍正在位十三年（1723—1736），乾隆长达六十年（1736—1796）。乾隆禅位于儿子嘉庆皇帝后仅仅四十四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处于被列强不断侵略、割地赔款、任意宰割、几乎被瓜分的危险之中，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首先就要认真研究被称为“盛世”而且占整个清朝一半的康雍乾三朝。

我的基本观点是：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康乾（或康雍乾）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作过高的评价。简单地说，我和一些学者的分歧不是对康雍乾三朝的肯定还是否定，而是评价的高低。因为批评“盛世”不等于否定三朝，肯定三朝也不必非评为“盛世”。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其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之世的得失，有助于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我讲三个问题。

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及其和汉朝、唐朝的比较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三朝先后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罗卜藏丹津、大小金川土司叛乱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康雍乾三帝最主要的功绩是将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由于清朝是人数很少的满族统治全国，它必须

更多地依靠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它一起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而且它必须努力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才能缓和与汉族的紧张关系并进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康雍乾三帝和此前的顺治等对加强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加快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一系列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将过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的土官土司改为由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而流动的官吏。这项工作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就开始做了，废除土司，设贵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但真正大规模进行是在清朝的雍正时期。雍正皇帝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在云南、贵州原土司统治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政治制度，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组织乡勇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从中央到省和州县各级政府对这些民族地区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过去在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不过是某个头人或土司的人。因此容易被人利用，发生动乱。“改土归流”之后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我是大清国人”）、统一观念（“某地是大清国的某省某州某县”）、大民族归属感（“我是大清国或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某族”）以及地域归属感（“我是中国某省某州某县的人”）等民族文化心理，而不是过去那样，“我是某族某部某头人或某土司的人”。因此极大地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远地区的管理与开发，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戴逸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这与传统观点不一样。”他认为康雍乾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乾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沉沦》）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简单化。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的下限距康雍乾时期（1662—1796年）的上限相差一千六百多

年。唐代（618—907年）的下限距乾隆末年也将近九百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口自然也大大增加。单纯从“养活三亿人口”的角度说“中国在康雍乾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国家”，而且已远超汉唐，是缺乏说服力的。汉朝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程度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相当于今日的美国或欧盟。而康雍乾三朝无论是哪一个，在当时的世界上都不具备这么领先与强大。而唐朝在当时的世界上之强大独一无二。且不说唐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部直达波斯、阿富汗、今中亚各国，东北到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北边达到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和外兴安岭以北的鄂嫩河，南边到今越南的河内一带，国土面积几乎比现在大一倍。唐朝的富庶也是康雍乾时期无法比拟的。据白寿彝总主编史念海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册引用《通典·食货志》记载的资料，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仅河南道与河北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存储的粮食就超过四千万石。加上全国其他地方的存粮总数达到九千六百万石，这还不算老百姓家中的存粮，而当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六千万。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物价非常便宜，青州、齐州一带斗米五文而已（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当时另两个世界强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首都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都不如唐朝，所以历史学家称“隋、唐皇朝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通史第六卷上500页）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程度。康雍乾三朝显然远远不如汉唐。

康雍乾时代和汉朝唐朝的主要差距还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

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汉唐时代政治环境比康雍乾时期宽松得多。汉代的皇帝总的说来相对地比较开明。刘邦虽然没有多少文化，而且比较粗鲁，爱骂人，但他为汉王时就很注意纳谏，所以萧何将逃跑的韩信追回能拜为大将军。刘邦称帝后陆贾等文人常常引用《诗》、《书》的文字劝说刘邦，刘邦烦了，骂道：“乃公（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

(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就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天下),宁可以(怎么能靠)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面有愧色,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结果陆贾连续上了十二篇治国方略的奏章,刘邦每看一篇都说好,这就是著名的《新语》十二篇。东汉前期也还较多地保持着这种状态,整个社会洋溢一种进取、开放、昂扬的大汉精神,所以班超才会不甘心于抄抄写写,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中洋溢着一种大丈夫气概,就是班超所说的“壮士志”。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武则天到玄宗李隆基都是比较注意纳谏的,对臣工相对比较尊重。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甚至是灭九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祸及。戴逸先生在《怎样》一文中说我“此话未免言过其实”,理由是不但“清前期书香门第,读书人家一般都会有李杜诗集,我们从未听说谁家因藏有李杜诗集而遭灭族或连坐之灾,相反乾隆皇帝……诗文中对李杜的诗更是一片赞扬……如果杜甫生于当代,乾隆皇帝愿意鞠躬拜倒。”我看未必。乾隆皇帝对生活在一千年前已经不会对他构成威胁的李白杜甫可以“一片赞扬”,“当拜下风”,“鞠躬拜倒”,但是决不会容忍他当皇帝的时候居然有这样藐视皇帝召唤的文人,也不会允许有人藏有这种对当朝皇帝大逆之作。我说“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如何如何,就是指李白杜甫如果生活在康雍乾三朝时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而不是李白杜甫的诗在一千年后的康雍乾之世的待遇。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年纪轻轻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豪迈、自信!有清一代找不出一个李白这样的人来。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充满进取精神、昂扬斗志和开放意识的大唐气象,大唐精神。清朝整整二百年没有一点豪迈之气,直到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才出现一些有气魄的作品,但那是忧国忧民,充满了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其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二、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失误

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中批评我没有对他提出“盛世”的条件进行反驳，那是因为当时我不愿把文章写得太长之故。所以现在我只好就此问题多说几句。戴先生说：“盛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康雍乾三朝在国家统一方面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我前面已经讲了，现在着重谈谈另外四个条件。

要想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总座标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中指出，“（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1520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太平洋。所以“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①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广大研究世界史学者的共识。

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将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都归咎于康雍乾三帝，因此首先要从公元1500年前后的明朝中后期说起。无独有偶，著名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选择了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的许多细节来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解剖。黄仁宇以大量事实证明：“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②明朝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弊病如果和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比，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整体实力遥遥领先，而欧洲则刚刚起步，中国本来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动乱、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1644年清朝在北京正式代替明朝以后，中国也完全来得及。但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使中国失去了整整两百五十年！而这里关键的就是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三十四年。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

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对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将它作为“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理由，进而似乎“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也有了合理性，实难令人信服。戴逸先生在答我的文章中说：“只有认真研究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才能找到铲除它的办法。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这才是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残余的正确途径。”此说需要商榷，因为产生封建专制制度和这种制度在某个朝代长期恶性发展，并不是一回事。铲除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固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基础薄弱就只能“发展生产”等等，就只能加强本来已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何况正如戴逸先生《怎样》一文中所言，康雍乾时期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实际上我对康雍乾三朝评价提出异议，并不涉及是否“铲除”或“根除”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问题，只不过是觉得评价过高罢了。

戴逸先生认为，“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此说我不赞成。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戴先生十分肯定的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中后期已经越来越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因为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只是对乾隆一个人负责，只要乾隆继续宠幸他，那就谁也奈何他不得。甚至连当上皇帝的嘉庆对他都没有办法，因为乾隆虽然禅位给了儿子，可乾隆还是太上皇呢。直到乾隆一死，嘉庆立即逮捕和珅，并且赐死。鸦片战争后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和军官素质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

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度的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而且这三个问题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轻商，轻视自然科学，只不过各个朝代程度略有不同罢了。至于闭关锁国，明朝前期就开始了。因此这三个方面都不是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特有的问题。戴逸先生在《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一文中说：“扼杀中国人思想活力由来已久，秦始皇汉武帝就在干这种勾当。自从中国有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人就在被迫做奴隶和奴才，逐渐形成国民的劣根性。而且时间久远，不易消除。”明朝也搞思想禁锢，也有书籍被禁，有人因文字招祸。而且后来八股取士，这就要求不但在考试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按照朝廷的严格规定行事。问题是清朝的文字狱比秦汉、比明朝要严重广泛得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不但规定苛刻，而且面广，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残酷，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轻则降职，重则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1711）已经“宽文字之禁”，但刑部仍然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以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戴名世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给功臣家为奴，给其书作者绞刑。过了两年，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作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三十二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而是全民性的灾难与恐惧。康雍乾三帝严厉处置“失察”官员这一招非常厉害。所以文字狱本身牵涉的人虽然有限，无非是几千人，但是由于各级官员都深怕由于自己失察而被杀或者丢官、降级，所以无不变本加厉地在各地严厉禁止一切对朝廷有一丝一毫触犯的文字和言行，于是整个民族自然就变得万马齐喑了。

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